



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建设成果

RECENT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ECONOMICS

方福前 · 主编

西方 经济学新进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西方 经济学新进展

RECENT
DEVELOPMENTS



WESTERN
ECONOMICS

方福前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经济学新进展/方福前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ISBN 7-300-07044-2

- I. 西…
- II. 方…
- III.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文集
- IV. F09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7588 号

西方经济学新进展

方福前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net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965×1300 毫米 1/16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6.75 插页 1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5 00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自“凯恩斯革命”以后，西方经济学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本书主要综述和分析了20世纪尤其是近20年来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成果。本书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微观经济学的新进展、宏观经济学的新进展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新进展。本书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把握西方经济学新发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内容。

前 言

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相比，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是相对滞后的。我们的哲学有中国哲学，历史学有中国历史学，文学有中国文学……而经济学就很难说有中国的经济学了。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学主要还是依赖“进口”。早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开始通过前苏联引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曾经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通过前苏联系统地“进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一部分师资力量。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和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系统地进口经济学。最初，我们的学生和研究者主要是通过中译本来学西方经济学；随着国人外语水平的提高，直接使用外文原版经济学教科书的院校越来越多。今天，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已经成为我国高校中经济学管理学各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

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即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预见到的；中国目前进行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事业，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没有具体论述过的。因此，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中国化”和“现代化”的要求。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和“现代化”，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建设实践进一步相结合的需要。我们认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中国化”和“现代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

建设。

西方经济学是根据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制度背景、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实践和经验写成的，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经济问题为背景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既含有生活在那个制度下的经济学家特有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观，也有反映市场经济一般关系和一般规律的理论，还有分析工具意义上的经济研究方法。因此，对西方经济学，我们首先需要系统和深入地研究，而不是片面和浅显地了解，只有这样，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才能有发言权；其次需要认真地加以分析，看看西方经济学中哪些理论是与它产生的那个制度和经济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哪些理论是特殊的理论，哪些理论是一般理论；最后需要结合中国实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中国化”改造，使其中的一些理论能够贴近中国的实际，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是建立在以下三方面工作基础上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的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来研究经济问题；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成果，包括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我们认为，这三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就会走向另一条道路；不联系中国实际，不从中国实际经济问题出发，中国经济学研究就是无的放矢；没有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改造，不借用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成果，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就要花费更多的工夫，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就要走更长的路。因为西方经济学虽然包含有意识形态的内容，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还是一种市场经济学。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在性质上和目标上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但是，不同的市场经济仍然具有共性，有许多相同的特点和规律。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学习、研究、分析和运用西方经济学。我们认为，未来的中国经济学，既不会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一种经济学，也不会是和西方经济学一模一样的经济学。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十五”、“211”工程项目“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中设置了西方经济学新发展专题研究的子课题。我们试图通过本课题研究把20世纪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近20年西方经济学的新成果、新发展展示出来，

同时加上我们的分析评论，以便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原材料。本课题的研究队伍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其中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的教师为主体。

本课题研究得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前辈高鸿业和吴易风两位先生的大力支持和指导。本课题研究成果的发表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杂志的大力支持。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主任陈翔云副编审就和我商讨合作办专栏一事。我们很快达成共识。此事旋即得到《教学与研究》主编李景治教授、副主编王学敏编审的大力支持。经过1年多的精心组织、准备和学术研究，从2004年第1期开始，我们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开辟专栏“西方经济学新发展研究”，我担任这个专栏主持人，陈翔云女士担任责任编辑。这个专栏前后持续了2年时间，本书大多数文章最初就发表在这个专栏上。我们对《教学与研究》杂志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本书现在收录的文章，有些是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过的，有些尚未公开发表过。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本次结集出版之前大多都由作者做了修改和补充。各篇作者情况如下：20世纪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与成果：方福前；厂商成本曲线的结构及动态演化：李天有；组织声誉与契约的隐性要求权——一个关于企业声誉的讨论：李军林；投资者行为、风险与资产定价理论的发展：陈彦斌；不确定性经济学对风险偏好的认识：黄淳、于泽、李彬；福利经济学中非福利主义的兴起：姚明霞；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与成果：方福前；消费函数理论的新发展：刘江丽、赵峰；行为消费理论的进展：刘凤良、李彬；宏观行为经济学的兴起：董志勇；IS-LM模型的新发展：方福前；关于李嘉图等价定理的争论：杨远根；三种类型的内生增长模型：杨斌；西方增长理论经验研究的新发展：刘凤良；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黄力克；通货膨胀的政治经济学：方福前、徐丽芳；制度演化理论的新发展：周业安；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贾根良、马国旺。

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在许多专题上都有新成果和新发展。由于我们的研究力量有限，我们无法全面综述和研究这些新成果和新

发展。而且，本书的各个专题研究仅限于我们的认识和理解，概述和分析不一定全面，不一定到位，甚至可能还有偏差。我们衷心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方福前

2005 年 10 月 20 日

写于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2 楼寓所

目 录

微观经济学的新进展

20 世纪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与成果	(2)
厂商成本曲线的结构及动态演化	(16)
组织声誉与契约的隐性要求权	
——一个关于企业声誉的讨论	(25)
投资者行为、风险与资产定价理论的发展	(37)
不确定性经济学对风险偏好的认识	(49)
福利经济学中非福利主义的兴起	(64)

宏观经济学的新进展

20 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与成果	(77)
消费函数理论的新发展	(102)
行为消费理论的进展	(117)
宏观行为经济学的兴起	(133)
IS-LM模型的新发展	(150)
关于李嘉图等价定理的争论	(164)
三种类型的内生增长模型	(174)
西方增长理论经验研究的新发展	(186)

非主流经济学的新进展

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	(208)
通货膨胀的政治经济学	(222)
制度演化理论的新发展	(235)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	(249)

微观经济学的新进展

20 世纪西方微观 经济学的发展与成果

微观经济学虽然在 19 世纪末就已经比较成型，但是这不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就已经完善了。一方面，随着西方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分析工具的使用，微观经济学在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获得了许多发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如果说产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现代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大家庭中的一个青年人的话，那么微观经济学则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中年人了。早在 18 世纪，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中就奠定了价值论的基础，而价值论则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并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论述了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性，即“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涉及的就是今天的微观经济学所说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斯密的《国富论》看做是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从 19 世纪 30 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在价值论上的分野开始，到 19 世纪 70 年代的“边际革命”，在“价值由什么决定”的论争中，微观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 19 世纪 90 年代，阿弗里德·马歇尔把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综合和提升，使微观经济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我们可以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 年）看做是微观经济学的代表作。

微观经济学在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获得了许多发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这些发展及其成果大大地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微观经济学在 20 世纪的发展。

一、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发展

消费者行为理论也叫需求理论，主要是解释单个家庭（消费者）在面临一组约束条件时如何对商品组合进行选择；它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试图找出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论述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向右下方倾斜（需求规律）。解释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先后有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和显示性偏好理论。基数效用论产生于 19 世纪，是需求理论中的古典理论。

虽然在 19 世纪末，一些经济学家就观察到效用的不可测性，提出了序数效用论的思想，如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安托内利（G. B. Antonelli）、费雪（Iving Fisher）和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埃奇沃思（1881 年）和安托内利（1886 年）甚至在 19 世纪 80 年代就使用了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但是，序数效用论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则是得益于斯卢茨基（Eugen Slutsky）、希克斯（John R. Hicks）和艾伦（Roy George Douglas Allen）等人的贡献。

斯卢茨基的贡献是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斯卢茨基方程”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位前苏联数学家、统计学家兼经济学家在 1915 年 7 月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关于消费者预算的理论》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商品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实际收入不变，商品相对价格变动引起消费者用价格较低的商品的消费替代价格较高的商品的消费，从而引起对价格较低的商品的需求量增加，这被称做“剩余可变性”，希克斯后来把它称做“替代效应”；另一个是货币收入不变，商品价格下降引起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增加，实际收入增加引起消费者对商品需求量的增加，这被称为“收入效应”。斯卢茨基进一步认为，这两个效应是独立的和可叠加的，二者的代数和就是“价格效应”。即价格效应 = 替代效应 + 收入效应，这就是斯卢茨基方程，后来又称之为“价值理论的基本方程式”。斯卢茨基还进一步认为，收入效应可以是正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也可

以是负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减少，而替代效应则始终是负数。

斯卢茨基方程的意义是从理论和方法上完整地解释了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完整地证明了为什么存在需求规律。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斯卢茨基在 1915 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最终给出了序数效用函数的假设。（伊特韦尔等，p. 850，1992）

希克斯在帕累托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了序数效用论，使之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篇主要是论述基数效用论（包括需求弹性理论）的，这种需求理论在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1939 年）出版以前一直是最权威的理论而受人敬仰。还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希克斯就对这种基数效用论提出质疑。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希克斯认为，马歇尔的需求理论是从最大限度的总效用观念出发，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达到所购买商品的边际效用必定与其价格成比例的结论。希克斯就此提出疑问：这种被消费者追求最大限度的“效用”是什么？什么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确切基础？他认为马歇尔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透彻的论述，而帕累托对此做过有价值的讨论。

希克斯从埃奇沃思和帕累托那里接过无差异曲线分析，用无差异曲线与消费者的预算线相切来确定消费者的均衡条件，用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取代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用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取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且讨论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推导了“收入—消费曲线”和“价格—消费曲线”。

由于序数效用论不以效用数量的衡量为基础，它用两种商品的变化量之比来间接衡量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这就克服了基数效用论“效用如何计量”的难题，从而使得序数效用论成为被普遍接受的需求理论。

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都是研究消费者如何使其偏好或效用最大化。但是，消费者的偏好是观测不到的，能够观测到的只是消费者做出的选择。那么，有什么办法说明观测到的消费者需求行为是否是由于偏好关系或效用函数的极大化而产生的？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消费者的实际选择行为推论出他的无差异曲线而不

是依靠他公开声称的偏好？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 1938, 1947）发现的显示性偏好理论（revealed preference theory）就是用来回答上述问题的。（Samuelson, 1947）

显示性偏好理论的优点在于，研究者不必知道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图，也无须知道每一种商品（或商品组合）的效用大小，只要知道消费者对有关商品组合的选择行为就可以了。根据显示性偏好理论，一个消费者之所以在两种商品（或商品组合）A 和 B 中选择了 A 而不是 B，只有两个原因：要么他偏好 A，要么 A 比 B 便宜。如果 A 不比 B 便宜而消费者仍然选择 A，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个消费者对 A 的偏好一定大于对 B 的偏好。为了给出显示性偏好理论精确性的证明，萨缪尔森和于泽（H. Uzawa）等人又进一步提出了显示性偏好的弱公理和强公理，这就是一致性（consistency）公理和传递性（transitivity）公理。

序数效用论以无差异曲线已知为前提。如果无差异曲线未知或不确定，则无法确定消费者均衡。显示性偏好理论可以用来确定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和需求曲线。

显示性偏好理论不但用来替代偏好理论作为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基础，而且还被用于证明竞争性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这种分析技术还在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

二、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

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单个厂商（生产者）也看做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其目标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厂商的行为和消费者的行为一样，都可以用一套最优化方法来进行分析。于是，厂商均衡条件（或生产要素最优组合条件，或利润最大化条件）以及围绕这个条件展开的产量理论、成本理论和收益理论，成为微观经济学中厂商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20 世纪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成果：一是各种各样的“厂商管理理论”（managerial theories of the firm）的提出。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认为厂商的目标（实际上是企业经理的目标）不一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称做“非利润最

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二是对“理性人假说”的批评和修正。

“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起始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对厂商决策行为的经验研究。1939 年霍尔和希契在对 38 家企业定价决策行为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价格理论与企业行为》的研究报告。(Hall and Hitch, 1939) 该报告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企业并不按照“ $MR=MC$ ”的原则来做出价格决策,也不一定根据市场需求来定价,因为企业很难获得关于单个产品的需求曲线的信息;企业对其产品定价实际上使用的是“成本加成定价法”,即根据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平均成本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幅度,这个利润幅度相当于一个行业内部的平均利润或正常利润。霍尔和希契认为,在“成本加成定价法”流行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只是一种偶然的結果,而不是企业经常追求的目标。1946 年莱斯特(Richard Lester)通过对美国南部 430 家企业的调查研究后发现,企业的产量决策和用工决策一般并不考虑“边际成本”或“边际产品价值”变动,因为企业难以估计这两个变量。这项经验研究成果也证明企业并不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行事。

贝利(A. A. Berle)和米恩斯(G. C. Means)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2 年)对厂商(企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本书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大公司在生产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些大公司里,所有权和控制权分别掌握在股东和经理手中;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和非竞争的产品市场,企业经理将拥有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外目标的空间。

在贝利和米恩斯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非利润最大化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鲍莫尔的“销售最大化模型”、彭罗斯等人的“企业成长理论”和威廉姆森的“管理斟酌决策权理论”。

鲍莫尔在 1959 年出版的《企业行为、价值与成长》一书中提出“销售最大化假说”(sales maximization hypothesis)。(Baumol, 1959)在这本书中,鲍莫尔把在某种利润约束条件下追求销售总收益最大化看做是寡头垄断者的典型目标。这里的利润约束是指企业股东认可的最低利润水平。鲍莫尔认为,企业之所以追求利润约束下的销售最大化,主要是因为销售量与经理人员的薪酬存在

正相关关系，其次是因为销售量下降会使得企业丧失一部分客户和分销商，降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

“企业成长理论” (growth theories of the firm) 归功于彭罗斯和马里斯的开创性研究。(Penrose, 1959; Marris, 1964) 这种理论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做是一种“公司经济” (corporate economy), 也就是公司企业主导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 公司管理者 (经理) 拥有斟酌选择公司追求目标的权力, 这就使得这种经济成为一种有管理的经济, 而不是完全的市场调节的经济。这种“企业成长理论”关注的是“企业扩展的时间路径” (the time path of expansion of the firm)。在动态过程中, 经理们通过把企业成长作为追求目标来满足其权力、称霸 (dominance)、威望 (prestige) 的本能, 而诸如企业安全和职业成就的动机诱导经理们把“企业的评价率” (the firm's valuation ratio, 它是企业股票市值 V 与其资产账面价值 K 的比率, 即 V/K) 作为其追求的目标。资本市场通过兼并和接管机制对这种评价率的高低施加约束, 如果评价率低于某一水平, 企业将被购并。企业面临的这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形式化表述如下:

$$\max U_m = U_m(g, v) \quad (1)$$

$$s. t. v \geq \bar{v} \quad (2)$$

其中, U_m 是管理效用函数, 即企业经理的目标函数; g 是企业的成长率; $\bar{v}$ 是对企业的评价率, 是资本市场约束, 当 $v < \bar{v}$ 时, 企业将被购并。给定一个成长—评价函数 (即 U_m), 其中 v 和一定水平以上的 g 负相关, 经理们将面临着图 1 所示的斟酌权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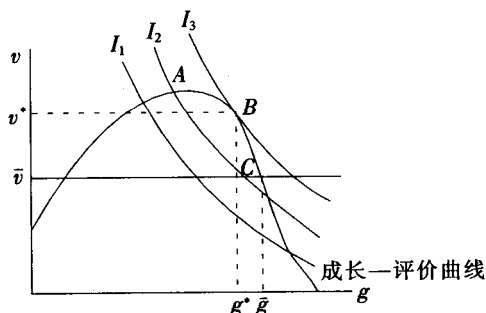


图 1 企业成长模型

在 A 点以前, 企业成长率 g 和评价率 v 正相关; 在 A 点以后,

g 和 v 负相关。企业经理对成长率和评价率组合的偏好可以用无差异曲线 I 来表示。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约束, 最优点将是最高的无差异曲线 I_3 与成长—评价曲线相切的切点 B 。如果评价率不能满足资本市场约束条件 $v \geq \bar{v}$, 那么, 最优的成长率将由受约束的最大化解 $(\bar{v}, \bar{g})$ 即 C 点给出。显然, C 点的成长率要高于 B 点的成长率。

“管理斟酌决策权” (managerial discretion) 理论是威廉姆森在 1964 年出版的《斟酌决策行为经济学: 厂商理论的管理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Williamson, 1964) “管理斟酌决策权”是指公司经理们有追求他们自认为有利可图的目标的能力或权力, 而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竞争程度将决定着这种斟酌决策行为的范围。

威廉姆森认为, 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大公司中, 经理们有一种支出偏好 (expense preference), 这种支出偏好通过某些企业支出如营销支出、职工报酬支出来获得满足。这些支出会给经理们带来正价值, 因为通过扩大这些支出有助于实现经理们追求薪酬、威望和权力的目标。虽然这些目标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些“非金钱目标” (non-pecuniary goals), 但是这些目标决定着经理行为, 从而影响着厂商行为。

理性人假说是关于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说, 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说基础上的。自 1947 年开始, 西蒙 (Herbert A. Simon) 在一系列论著中反复强调经济当事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 而不是理性人假说所暗含的完全理性。(Simon, 1982)

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效用论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前提条件之上的: (1) 可供选择的对象是给定的, 而且是固定不变的; (2) 每种选择结果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 (指主观而言); (3) 目的是为了使一个给定的效用函数的期望值达到最大化。西蒙认为, 这些假设条件并不一定与我们想要知道的实际经济选择过程相一致; 通过放松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假定可以得出“有限理性论”。

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是指那种把经济当事人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理性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西蒙认为, 虽然经济当事人总是期望实现最优化, 但是他们事实上做不到, 因为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要受到获得有关选择机会的信